抗日战争中的临汾

——临汾人民八年抗战事略

孔祥智

1937年7月7日晚10时,芦沟桥畔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日本侵略军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何梅协定”之后,得寸进尺,再次发动“七·七”事变,把侵略战火从东北三省烧到华北,鲸吞华夏之图谋,昭然若揭。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早在“何梅协定”签字之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中华民族面临涂炭,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在此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东渡黄河,进入山西。3月17日,在抗日先锋军红二师四团团长黄寿发、政委罗华生,二团团长梁兴初、政委吴文玉率领下来到临汾,分别在汾河东西的乡村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和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当时,中共地下党员杨一木同志代表临汾党组织同红军取得联系,并且在红军的直接帮助与支持下,组建了临汾龙子祠抗日游击大队。这支抗日武装曾配合红军参加了攻克襄陵县城的战斗。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原拟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但由于遭到蒋介石、闫锡山军队的拦击,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5日全部回师黄河以西。临汾龙子祠游击大队200余人和全县各地报名参加红军的586名贫雇农民子弟也同时随红军西渡,到达陕北。这是临汾人民为了抗日战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出的第一支有生力量。

红军东征给临汾的乡村播撒下工农革命和抗日救亡的种子。红军走后,全县集镇、乡村到处掀起了‘军政民齐武装,一起来救亡’的高潮。以村为单位,群众自发组织了自卫队,拿起大刀、长矛保卫临汾,保卫家乡。到 1937 年底统计，全县武装自卫队人数达 8000 余人。全县五个区,除城关的一区外,其余四个区都组建了一个连的武装自卫队,任务是同兄弟区的武装自卫队密切配合,相机打击土匪和散兵、游勇,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937 年 7 月，山西牺盟会为了在全省建立牺盟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决定向各县派遣牺盟特派员。当时,来临汾县任特派员的是共产党员李从文同志。那时,中共临汾县支部已经恢复,由王亦侠(女)任支部书记,王金林、朱剑白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李从文同志在党组织和山西牺盟第六中心区的领导下,利用牺盟特派员合法的身份,大胆开展工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组成了临汾县牺盟分会,并在各区和部分村镇建立了牺盟会组织。与此同时,还在各区村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教师救国会和儿童救国会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同年 9 月下旬,中共临汾县支部撤消,中共临汾中心县委成立。由梅村任书记,王金林、刘舒侠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不久,中共二区区委和四区区委也分别在土门镇和东亢镇成立,以牺盟会的名义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至此,临汾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初具规模。

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同时出现了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局面。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9 月初在朱德总指挥的率领下到达山西抗日

前线,进抵平型关附近设伏,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

同年 10 月下旬,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猖狂进攻,省城太原危如垒卵。当时驻在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委以及闫锡山的山西省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绥靖公署等军政首脑机关相继撤到临汾。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驻汾河西岸的帽儿刘村 中共山西省委驻城内何二胡同 闫锡山的省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土门镇的东西涧北村。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 ,副书记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也先后到达。北方局在刘村举办了党员训练班，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领导骨干 ;12 月末 ,北方局还在刘村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 ,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发展与新任务》的报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迁到临汾不久，即受北方局的委托，责成何以祥同志创办了八路军学兵大队，吸收大批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 ,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近千名有知识和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政干部。与此同时 ,闫锡山还在城内的关帝庙设立了民族革命大学 ,除本部外还在运城、长治等地设分校若干处 ,招收学员 5000 余人。

太原失守前夕 ,周恩来副主席撤离太原来到临汾 ,检查兵站工作 ,部署支前事宜。11 月 14 日从临汾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反对妥协求和 ,坚持华北抗战》的电报 ,并就电报中提出的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扩大部队 ,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等问题向驻临汾的北方局作了部署 。16 日 ,周恩来副主席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 ,向千余名群众作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讲，提出了改革军队 ,开放政权 ,开放民运 ,肃清汉奸 ,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会后 ,听讲民众自动捐资 ,将演讲稿印刷数十万份 ,散发全国各地，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之后 ,民族解放先锋队 ,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相继来到临汾。

北战地服务团领导人，著名女作家丁玲同志在关帝庙前的平台上，向临汾的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作了题为《青年的出路》的报告,并率团演出了多场文艺节目。其中《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一些看过节目的老年人至今记忆犹新。随团来临汾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同志在学兵大队听了彭雪枫主任讲的游击战术后,极度兴奋,连夜挥笔写出了抗日歌曲《游击队歌》,先从学兵大队唱起,之后,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鼓舞着无数英雄健儿去英勇杀敌。当时,朱德总司令多次同闫锡山的会谈在这里举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 战略决策性的电报,文件从这里发出；一些领导干部和新参军的抗日战士从这里走上前线；很多作战物资和群众的慰问品从这里运往前方。当时,临汾已经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

烽火遍燃临汾大地

继太原失守之后,日军长驱南侵,晋中各城相继沦陷。当时仍在担任临汾县牺盟分会特派员的李从文同志为集中地方武装保卫家乡、受中共临汾中心县委指示,于 1937 年 12 月,组建了临汾县民众武装自卫总队。自卫总队由各区民众武装自卫队组成,下分四个中队,约 500 多人,李从文任总队长,张培森任副总队长,景仙洲任总教官,驻城内第一高等小学校。此时闫锡山为保存实力,已将他的军队撤到乡宁、大宁、陵县一线,国民党军队则集中于翼城,沁水山区；临汾仅留下一个晋绥军官教导团驻扎在城南的尧庙一带。1938 年 2月下旬，一路由河北侵入晋东南的侵华日军经沁源、安泽,直取临汾。当时,闫锡山的军政机关早已撤过黄河,搬到陕西去了 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已安全转移。

2月 21 日，中共临汾中心县委，临汾县牺盟分会和武装自卫总队的领导人在城内塘子口教育会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 县委、县牺盟分会和武装自卫总队部全部撤到河西去,指挥二、五区

的武装自卫队打游击,三、四区的武装自卫队仍留在河东,坚持抗日斗争。

临汾失陷前夕,阎政权的县长牛甫毅(一说李凯朋)携带印信,公款弃城逃跑,李从文策马追赶,夺回印信和公款。不久李从文同志被闫锡山的山西第六行政公署任命为临汾县县长。

2月27日,日本侵略军一路经洪洞的曲亭镇进入临汾,平阳古城陷入敌手,并占领了汾河沿岸,同蒲铁路一线。从此,临汾河东和河西的联系被切断,党政军民的抗日活动处于分割状态。当时,中共临汾中心县委已撤消,中共临汾县委成立,梅村任县委书记,并在金殿镇召开了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转入地下,迅速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

当时,临汾县的抗日指挥中心在河西,县长李从文同志,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率领河西人民向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地斗争。他首先将河西二、五两区的武装自卫队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日决死二纵队第一游击支队,集中训练,统一指挥,打击小股日军的活动。1938年小麦返青时,日军组织了两千余兵力,对李从文领导的县政府和第一抗日游击支队,发动了猖狂进攻,企图一举歼灭这支抗日武装。李从文同志利用农民浇灌麦田的时机,放水淹没道路,以水代兵,挫败了敌人的进犯计划。之后又组织了夜袭尧庙飞机场,攻打襄陵县城等战斗,给驻临日军以沉重打击。5月初,第一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决死二纵队游击第五团第三营,转战于襄陵,临汾、洪洞河西一线。其次,中共临汾县委为扩大抗日队伍。由临汾县政府出面创建了临汾县抗日干部学校,为抗日前线输送了近200名骨千力量。

临汾河西抗日斗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军政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怒火,引起了驻临日军不安,接连向河西抗日军民发动进攻。1938年农历六月初六,日军渡过汾河,向东麻册,沙桥,马站,韩家庄,泊庄,泊段,乔家院、涧头等村进犯,一天之内杀害无辜百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70 人,烧毁房屋 1800 余间，仅涧头村就被残杀 47 人,有 8 家被杀绝,有 11 个孩子成了孤儿。同年 11月 26 日，日军万余人在师团长谷口率领下,进犯西山,在坡底村残害抗日军民 18 人,抗日英雄李福消,李福秀姐妹同时惨遭杀害。

1938 年 12 月 2 日，闫锡山为配合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日军侵略军勾结,发动了“晋西事变”(即 12 月事变),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决死队以及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发起了猛烈进攻。作为临汾县抗日斗争指挥中心所在地的河西地区,抗日政权被摧毁,抗日群团被解散,抗日武装遭围剿,临汾人民的好县长李从文同志被杀害。一时,汾河岸畔,吕梁山下阴云密布,腥风血雨,抗日军民处于日闫勾结的白色恐怖之中。当时,中共临汾县委已奉命撤消,成立了中共临襄(河西)县委。县委和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在上级党组织提出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导下,以各种社会身份隐蔽起来,坚持斗争。这种隐蔽斗争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河东军民　坚持抗战

如前所述,临汾沦陷后,临汾县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汾河以西,为了继续领导河东民众坚持抗战,山西第六行政公署曾一度责成谢荒田同志组成河东特区委员会（政权机关）。春末,又改组为相当于县级政权的临汾县河东抗日办事处，由张挺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后为陆志青、王志舜等。同时组建了河东牺盟分会和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工救会、教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抗日武装自卫队由景仙洲同志将三、四区的两个中队合编为第四中队,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这支武装力量,几经改变番号,最后由朱德总司令自亲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汾东游击支队，发展成一个团的建制,战斗在临汾、浮山、洪洞、赵城、霍县等河东一线,曾参加了“百团大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保卫人民,打击敌人立

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共产党的组织为临汾河东特区委员会,由张平同志任书记,下辖三、四区分委和边沿区分委三个区级委员会。

这期间,河东民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抗日武装部队同日军展开了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大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党的河东特委还通过抗日办事处的公开身份培训了一大批抗日干部,送往前方。

1939 年 9 月,为粉碎日军“以碉堡为锁,以公(铁)路为练”的锁练政策,上级党委决定撤销临汾河东特区委员会,将临汾、襄陵两县以铁路为界,成立河东中共临襄县委,乔克勤同志任县委书记,领导临襄人民开展对敌斗争。

“晋西事变”后,河东党的组织和抗日政权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席铬等同志被杀害,抗日救亡运动处于低潮。在闫锡山的疯狂屠杀和日本占领军的猖狂进犯面前,河东人民没有屈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抗日干部隐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抗日斗争。中共临襄县委的同志干脆把县委机关搬到离城只有 7 华里的小程村张耀庭同志家里坚持斗争,有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这时,国民党的九十三军在临汾、襄陵的河东一带,成立了所谓“塔山设置区”,相当于专员公署一级机关,消积抗日,积极反共,临汾人民的抗日斗争处于日、闫、蒋三方夹击之中。这是临汾河东军民坚持抗战的最困难时期。

1942 年夏,国民党驻晋南的军队被日军击溃,闫锡山的六十一军被八路军赶到汾河以西,临汾、襄陵河东地区出现一大片空白区。当时,太岳区党委决定临、襄汾家,成立中共临汾县委和临汾县抗日政府。并先期派遣景仙洲,曹博生等同志率汾东支队打开局面。10 月份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由石金河(又名五毅)同志任县委书记,曹博生同志任代理县长,后由程诚同志任县长。 这是临汾县抗战以来第一任意义上的人民抗日政权。不久,县政府为便于开

展工作,将原来的三、四两个区,各一分为二,分为一、二、三、四 4 个区,并建立了党的区委会和区政府。鉴于“晋西事变”的教训。临汾抗日政府成立后，很快组建了一支人民武装——临汾县游击大队,由杨荣同志任大队长,杨荣牺牲后,由朱继儒同志接任了大队长。同时，各区也都成立了区分队。这支抗日武装从 1943 年 1 月至 1945 年 8 月的 3 年多的时间里，活跃在敌人设置的“格子网”里,同敌伪作战近百次,歼灭日、伪军千余人,特别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破击铁路,切割电线达 22 次,给驻临日军以沉重打击。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整编为太岳军区警卫四团的一个营,投入了解放战争。

临汾县河东抗日政权,从 1942 年成立以后，领导河东的广大群众开展了地雷战、游击战、进攻战,打得日军守在铁路沿线的碉堡内,不敢轻易出来活动。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临汾人民同仇敌忾,一往无前,为了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临汾人民参军人数 2690 人,牺牲 268 人 参战(即支前)人数 7588 人次,牺牲 148 人；捐助支前物资折合白洋 20.8 万元。

八年中日伪军打死临汾县平民百姓（包括自卫队员)1855 人，打伤致残的 3488 人 因日伪军骚扰冻饿而死的 2240 余人,被日伪军强奸的妇女 1221 人，被日伪军宰杀的耕畜 8588 头,猪羊 82494 只,被日伪军烧毁民房 8596 间，被日伪军抢劫财物折合白洋 153 万元。

日本侵略者给临汾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真可谓罄竹难书。事实胜于雄辩,让那些至今还在粉饰侵略为“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无耻谎言见鬼去吧！

姑射山下红烂漫

—— 记抗战初期的帽儿刘村

孔祥智

引　子

滚滚奔流的黄河,她是一条民族河,是一条母亲河 纵贯三晋大地的汾河,就像她的一条强壮有力的手臂,将千百万炎黄子孙紧紧搂抱在她的腹部,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他们茁壮成长。这里是黄河儿女的襁褓，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就在这巍巍平山之阳,滔滔汾水之滨,临汾市西郊,座落着一个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千年古镇——帽儿刘村。

为什么叫帽儿刘村呢 ?一句问话,打开了 1937 年的抗日村长、离休老教师靳华尧的话匣子,他像八九月里的葡萄,一嘟噜,一串子,讲述了一大堆关于帽儿刘村的故事。

大凡一个村名都有它的特殊来历。比如张村,一定是姓张的率先住在那里 吴村肯定是姓吴的第一家在那里定居。刘村的来历却非同凡响。

据传说这里曾经是东晋时汉国皇帝刘渊的第四子刘聪的居地,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朔朝嘉靖年间,刘村又出了个大人物,他叫张润,一生任过工部,吏部和户部三部尚书,死后埋葬于此,“尚书坟”至今犹存 在同一个朝代里,这里还出过张文达父子三人同榜“进士及第”的传奇故事,人称“三进士”。还因为这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习惯以她们灵巧的双手,把洁白的麦秸杆儿,掐成精致的草辫儿,缝成漂亮的草帽,人们就给刘村的头上戴了一顶桂冠,叫作帽儿刘村,这些都是遥远的历史了,要说起她的不平凡

来,还得借用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里的一句名言“:俱主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里的民众热爱共产党、八路军

1937 年 10 月下旬的某天中午,从太原南下的火车上,跳下来一群英俊威武的年轻战士,稍事整理了一下行装,便列队向出站口走过来。他们是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第一批撤离太原,来临汾的先头部队,走在前头的是总务科副科长周辉。

临汾,这座古老帝都,一反往日的宁静,恰似一头猛醒的狮子,抖擞精神,放声怒吼,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集会的人群“;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周辉一行一出火车站第一眼看到的是车站上浩如烟海的人群和震耳欲聋的吼声。这里在举行抗日救亡演讲会,临汾县牺盟特派员李从文大声疾呼“:日寇入侵,江山破碎,国亡在即,家何以存!乡亲们,同胞们,有血性的青年们,不愿当亡国奴的朋友们,丢掉幻想,拿起武器,起来战斗吧!’民众振臂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知是谁领了个头,民众齐声歌唱:

同胞们! 大家起来。

一齐站在统一战线上。

不分派,不分党,工农兵学商;

无老幼,无级阶,统同联合来救亡。

任凭鬼子横行霸道野蛮又混账,

只要我们胶地团结意志坚如钢。

拿走斧头与锄头,掀镢与刀枪,

直向着敌人冲锋前进!

冲锋前进把鬼子赶出鸭绿江,安葬太平洋!

这里与阴惨惨,死沉沉,弃家亡命,乱作一团的太原,恰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周辉一行没有时间顾及眼前激动人心的场面，使命感促使他们匆匆向临汾东关十字北，八路军总兵站走去。

晚上,周辉在灯火如豆的煤油灯下,向八路军总兵站杨立三站长传达了首长的指示后说：“要选择一个既能保证不易被敌人发现，又便于指挥全局，且能与广大民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地方……”

第二天凌晨，周辉一行便向与临汾城隔河相望的帽儿刘村出发了。

金秋十月,汾河两岸棒子黄澄澄,豆夹圆鼓鼓,……辛劳半载的农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抢收着大地的赠品,劳作的报酬。看见周辉一行,都以惊异的目光,盯着他们由远及近,而又由近及远。一个眼尖的小伙子,意外地发现他们左臂上的‘八路’字样,顿时狂奔欢呼:‘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新任刘村村长的靳华尧听到喊声,连忙放下手中的农活,尾随其后,急急向镇内赶去。

“七·七事变”的隆隆炮声,揭开了抗日救亡的序幕。狂妄的日本侵略军继陷平、津之后,得陇望蜀,步步紧逼,9月侵占大同,山西省城太原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驻山西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委等,决定移驻临汾,坚持华北抗战。周辉一行就是奉首长指示先期来临汾安排住处的。在靳华尧的热情帮助和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五同丰、徐家院以及三官庙等几处比较宽敞的住宅,很快誊了出来。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二科的名义（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外保密)设在五同丰东西两院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设在徐同寅家前后大院里。

11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亦称陶教官),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当时称杨主任,亦称杨教官),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等领导及其随行人员先后到达刘村镇。紧接着八路军炮兵团和丁玲同志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相继到达这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袅袅炊烟,招来了镇上的黄昏。全副武装的炮兵团官兵 清一色灰制服的北西战地服务团演职员，手持大刀长矛的刘村自卫队，以及三五成群身着各色服饰的乡亲父老,汇成股股洪流,涌向三官庙。这里在举行军民联欢大会。

大会还没有开始，对外称作杨主任的中共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同志健步走到台上,幽默风趣地说“:我这个人就是爱听抗日歌曲,一听浑身就来劲。我提议请炮兵团的同志们给咱唱支抗日歌好不好?”军民齐声欢呼“:好呀!”

全国动刀兵,一起来出征。

你看那个大旗,飘扬多威风。

这彪人马哪里来？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一起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

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歌声余音未散，经验丰富人称青年秀才的炮兵团三连文化教员小余就喊上了“:请自卫队的同志们唱支歌儿好不好 ?”军民齐声响应“:好!”

你别看自卫队都是些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却粗而不俗,狂而不野。特别是在炮兵团受了几天训练，还真有那么一股子军事性、纪律性,经队长一声‘ 起立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唱起了昨天晚上刚学会的《军民团结打日本》：

青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

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叫声呀老乡,听呀听分明，

这就是那坚决抗战的八路军。

八路军呀来,爱护老百姓，

老百姓来,也要支援八路军。

军民团结大家一条心，

打倒那个日本鬼子享呀享太平！

歌声中，一位戎装素裹，英姿勃勃的青年军人出现在台上，满面笑容地为自卫队打着拍子。等歌声停了，他才摘下军帽向台下行了一个鞠躬礼，以洪钟般的声音宣布：“现在军民联欢大会开始！”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静得几乎鸦雀无声。

“今天举行这个联欢大会，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关键时刻，我们来到刘村镇多蒙乡亲父老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协助部队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代表全体官兵表示衷心谢意；二是通过这个联欢会，与大家见见面，互相认识一下，以便于今后联系。我就是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以后……”

“啧啧，年轻轻地就当上处长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嘛！”群众以钦佩的目光端详着，议论着。

“下面请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给我们演出节目”彭处长说着带头鼓掌欢迎。

鼓乐起处，演出开始。精彩的表演，激起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限愤恨和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

会场上鼓乐声，口号声和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云霄，一片十分浓郁的鱼水之情。

这里已形成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

北方局和“八办”的到来，使一向幽僻平静的帽儿刘村顿时繁华热闹起来了。当然，广大民众并不知道这里有个指导华北抗战的党的领导机关——北方局，但人们确信抗战的希望在这里，民族的出路在这里。因此，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进步学者，爱国侨胞和优秀青年纷至沓来，给这个千年古镇，涂上了一层新鲜而又明快的色彩。

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一到刘村，不顾远道跋涉的劳累，便与副书记杨尚昆一起研究工作。他们总结了前一时期北方局工作的

经验教训,制订了“华北今后对日寇的主要斗争形式,应由‘七·七事变’前的非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提出了“广泛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尽快发展和壮大武装力量,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集团军,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的中心任务。在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他把这个方针和任务提出来与朱德总司令商量,得到朱德同志的赞同与支持,并很快分发各级党组织贯彻实施。

1937 年 11 月末,刘少奇、杨尚昆以及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等领导同志从刘村出发,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径吉县时,在那里亲切接见了正在建立和集训吉县抗日自卫队的张秀成和张铁民,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着重就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只能动员群众,武装群众,以扩大了的人民武装战胜凶恶的敌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杨尚昆书记补充说:“要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开放民运,让群众起来自己武装自己,自己保卫自己,只要做到这一点,抗战胜利就有希望。”

1938 年元旦过后,已是“三九、四九,冻破石头”的隆冬时节,若在往昔,人们早已一家一户关上房门共享天伦去了。但今年的刘村镇,却一反常规,人们不避严寒的日夜奔忙着:“八办”门前人来人往,一批批报名参军的青壮年,匆匆地走来,不大一会儿,换上整齐的灰军装又匆匆离去。五同丰大院里,也有三三两两服色各异的人出出进进。这里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临汾会议。

会议刚刚开始,在杨尚昆同志主持下,刘少奇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他严肃地指出:去年十一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王明同志,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

告,他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向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和‘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自愿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抵制,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临汾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还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发展与新任务》的报告。动员党的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精神,按照毛泽东同志《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大胆放手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掌握武装,建立与发展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会议还对扩大八路军,尽快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问题作出决定。

数九隆冬,寒风刺骨。会议结束后,各地方,各区域党的领导干部便冒着严寒,怀着一颗颗火热的心,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发动群众,开放民运,一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大地上蓬勃兴起，并将逐渐向全国各地蔓延开去。

临汾城内何二胡同一座市民四合院里，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和临汾会议决定，提出了一项二十天在晋南扩军三千人的任务,并责成张稼夫同志具体承办。林枫同志为此专程赴运城召开了中共河东特委扩大会议，部署扩军工作，在广大群众“ 抗日才能救国,救国即是保家 ’的强烈呼声中,仅用十五天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为八路军补充了一批精壮兵员。

临汾会议后,烽火熊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好‘ 戏 ’连台，他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建立了近千支游击武装，在八路军正规部队的配合下，开展了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先后开辟了太行、太岳、晋西北、晋西南、晋中、冀鲁豫、冀东、冀南等抗日根据地，把入侵之敌团团包围于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冬天的夜总是漫长的,长得让人心烦。特别是对那些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尤其是这样。住在五同丰西院东房的刘少奇同志,五点钟就起床了。他身披一件灰色军大衣在院子里踱起步来,高度集中的思维,使他忘却了严寒,在东西不足二十米的小院里,不知踱了多少个来回,只有住在南房的房东史希杰从窗户上那块方广盈尺的玻璃镜里,心痛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不敢去打扰他,因为他知道,每当‘陶教官’在院子里踱步的时候,一定是在考虑一个什么重大问题,这是他来刘村后的老习惯了。

天色刚刚泛白,杨尚昆同志便拉开西房的门,关切地问:“怎么样,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么?”

“不,睡了一阵儿,”刘少奇搓着冻得发麻的双手,与杨尚昆一同进了西房。

“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把大衣往紧里裹了裹,坐在靠墙根的一把太师椅子上说:“我们是否可以挤点时间,办个党员干部训练班,给山西培训一批党的地方干部,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游击战争紧密结合起来了。”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山西省委也有这个打算。”杨尚昆把爆烈着火花的木炭火盆往前移了移,接着说:“前几天张友情同志还为这事来找过我,我答应把学兵大队办起来以后,接着开办党训班。”

刘少奇听了杨尚昆的话,兴奋地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啊,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马上通知张友清同志来这里,研究办训练班的事。”

三天后,党训班就在五同丰西面的一座农家大院里办起来了。第一期参加学习的学员有武光、巨任吾、马玉书,李熹、李铨、卢明要、徐立民、张惠爱、秦穆伯等十几个人,彭德同志任班主任。刘少奇、杨尚昆、张友清、林枫、黄骅、李昌、刘道生分别担任教员,轮流讲课。

一天早饭后,一位身材单弱,操着湖南口音的教官来到党训班

教室,他就是刘少奇同志,为了保密,学员们都知道他是‘陶教官”陶尚行。他讲的是《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他说:“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沿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人民的抗日政权。”

他的嗓音不高,经常咳嗽,但讲问题却精细透彻,富有哲理,给学员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党训班共办了三期,为中共山西省委培训了 60 多名党员干部,这些同志随着岁月的积累,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演讲给这里的民众打下浓重的“底色”

1937 年 11 月 4 日的太原,敌机轮番轰炸,隆隆炮声可闻,大街小巷弹坑累累,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废墟里,残垣下,随时可以发现无死难者的尸体,并州古城,危如累卵。

在此危急关头,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里仍旧秩序井然,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仍在镇定如常地聚集在一起谈论着,说笑着。他们在讨论南迁的行动方案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来到临汾。他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便立即着手工作。他首先去八路军总兵站检查物资的储运情况,听取了杨立三站长的汇报,要求兵站上的同志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八路军捐粮、捐款、捐物支援抗日战争 同时,要做好军需物资的贮存,分发和转运工作,及时发往前线 他还要求兵站尽快把临汾各界人士写给八路军将士的慰问信送到前方战士手里,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多打胜仗。紧接着在临汾县牺盟特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